

社会企业与自然资本



汪永晨/文

环保 NGO 绿家园召集人

留下最后一条大江

“江河十年行”是绿家园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行动计划。自2006年起,这项行动已近十年。我们希望记录西部江河在这十年间的水质变化,并选取江边的十户人家、十个特殊景观进行观察,把这些百姓的命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同记录下来。这一记录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还要把记录下的问题告诉公众,影响决策,保护利益相关群体不受到伤害。

自始至终,我给自己的定位仍是一名记者,这一职业更符合我的天性。但自从关注自然以后,环保志愿者的身份便和记者职业交融,以致天平甚至有些倾斜了。这十年来我所做的事,对于一个职业者来说是“越位”的。但我走上公益环保之路,也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触动。1993年,我在青藏高原做一个有关生态话题的采访,在那里,我看到了在那么美的环境中被猎杀的野牦牛。如果不是看到野牦牛在自然奔跑的样子,杀了一头牛也就只是杀了一头牛而已。但是在那种状态下,你就会觉得它们有点无辜,就想要去保护它们。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这辈子我要把大自然的美和大自然的问题告诉更多的人。另一个触动是1994年,我采访一个爱鸟成痴的人,他对我说“小鸟是人类的朋友,而朋友正在不断远去”,这句话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也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真正让我下决心走上公益之路的,还有一个领路人——一个美国的老太太。2006年,我在她的支持下去了美国,接触了美国的一些环保组织,在那里学到了怎么找钱、怎么开展活动等方法,回国后就成立了绿家园,从此开始了环保公益之路。

今年,绿家园的怒江生态文化采风活动刚刚结束。在这样的活动中,当地人的不理解是最让我们难过的事情。我现在在怒江是一个危险分子,当地人家一听汪永晨这个名字就恨不得在边防那儿多看两眼我的身份证。每次去怒江,当地村子的派出所都会对我们严格检查,此次出行还受到不明原因的跟踪。甚至一个村长还质问过我们:“你们不要老来骚扰

我们,你们能为怒江做什么?”当地人总认为,他们现在这么穷,他们需要发展,尤其是经济上的发展,而我们仿佛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但这样的情况也是在慢慢改变的,我们用行动努力给当地留下了一条自然流淌的江河,在这种努力之下,怒江不仅给当地人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带来了文化和生态效益,每年一次的怒江行也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

“江河十年行”一共关注了6条大江,而怒江已是中国最后一条自然流淌的大江了。

2004年,我第一次去怒江,发现那里已经有了勘探的迹象,特别是从2006年到2008年这3年,江上面都有船在钻江心、凿江壁。怒江壁是千万年形成的绝壁,施工者在上坝址、中坝址、下坝址都进行了勘探,如此天然的壁画就这样被破坏了。直到2014年三四月去的时候,虽然政府批文仍然没有下发,但前期勘探工作仍在进行。今年最大的改观是当地一个施工工人都没有了,政府在怒江建水电站的计划搁置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不是仅仅反对建一个水坝,而是呼吁环境评价的执行,呼吁监督机制和政策的透明、信息的对称,呼吁在工程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怒江干流上的水电站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动工,不能不说是中国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谏言的结果。

虽然大水电站不建了,但怒江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水电站。2009年“江河十年行”去的时候才三十几个,而到2013年各类小水电站就多达100多个,沿江的小水电站密密麻麻。小水电站不仅没能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而且随之而来的开矿、建高耗能企业等行为,对当地环境又是一种污染。

我们认为,一条大江的价值,不应只有经济效益,而应当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得的。现在的怒江虽然没有建水电站,但在我们多年的努力下,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旅游胜地,还开展了国际性的赛事,通过这种不干涉自然的保护,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在经济有了发展、当地人富裕起来之后,怒江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节日也开始慢慢发展。如此一来,经济、文化、生态共同发展,皆大欢喜。



褚莹/文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近年来,社会企业发展的如火如荼,影响巨大。2001年,英国政府组建社会企业局,负责支持社会企业。2005年,英国政府又通过了《社会公益公司规则》,从法律层面为社会企业赋权。美国政府在社会企业方面也给予了很大关注。美国有一种独特社会企业,即L3C公司(低收益有限责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目前,美国已有十个州正式立法承认了L3C公司。截至2013年1月11日,美国已成立有711家L3C公司。

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企业这一全新的社会公益运营模式也已经渐趋成熟,在社会领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过,在社会企业领域内依旧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即在社会企业产出社会效益的时候,如何收费,从而与社会共享效益的问题。导致出现这一问题的一个重大症结在于有效计量手段缺失。目前,我们缺乏有效的计量手段,无法评估社会企业创造的公共利益的

经济价值,也就无法给予合理的补偿。这导致社会企业在创造出社会价值的同时,经常会因为生存困难而倒闭。

这一问题涉及社会企业业绩计量的问题。目前,围绕社会企业业绩计量,业界主要采用社会企业综合业绩计量的方式,即将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价值与社会影响融合在一个评价体系之中进行测算。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重底线”定性测算模型,即从财务业绩、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三方面计量社会企业综合业绩。

不过,这种计量方式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由于其无法对社会价值做出定量的判定,导致我们无法评估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比如,我们无法评价陪伴老人服务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也无法测量救助一只被石油污染的猫头鹰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如此一来,社会企业的价值计算就缺失了一大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社会价值资本化,比如自然资本。所谓自然资本,指的是有利于我们生计的自然资

源和环境,比如:土地、水、水循环系统等。通过国际的共同努力,其已经成功实现了量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自然资本交易所,人们可以在这方面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交换资本。比如,某饮料企业在沙漠中种植植物,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实现了固沙防风。这也就创造了自然资本,其可以通过相应的交易所换取更多的资本金。又比如,某企业将秸秆用于发电。这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也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而且,其还可以通过交易所将这部分自然资本出售,以换取更多的资本金。所以,自然资本的推广应用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通常而言,自然资本的直接出资方是政府或直接相关主体。政府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压力,所以才会运营市场化手段,以出资购买自然资本的形式实现政策目标。同时,政府还会出台政策,要求企业等相关主体保护自然环境,不达标企业只能通过交易所交易的形式,购买其他企业的自然资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本的最终买单者还是享受了良好自然的公众。

目前,自然资本在我国已经初步兴起了。学界和实务界也开始关注到了这一领域。但其仅是社会价值量化评估的一个开始。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社会企业在世界上的作用会越来越来,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的传统企业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架起大学生和留守儿童间的桥梁



崔子研/文

资深公益人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生连续三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纸房乡草庙村组织开展“关注留守儿童”实践团活动,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形成了来源于实践的颇有价值的报告、论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为大学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大学生群体关注留守儿童,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国情认识,调动大学生群体力量,提高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实践水平,引导社会的舆论导向,无疑都是积极必要的。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工作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有假期,

能够集中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较为扎实地深入到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当中,克服了参观考察、走马观花的弊端;二是当代大学生知识结构综合、信息处理能力强、研究问题工具手段新,远较当地乡村教师及志愿者先进和现代;三是大学生与留守儿童的年龄差距和代沟现象要小于留守儿童的父母,更远小于祖辈,这为沟通、引导、互动带来方便。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工作是留守儿童的需要。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家庭、教师、社会、政府等各方面都有缺失,但榜样的缺失十分紧迫。如果

教育出现偏差,由于感情的认同和人才参照系缺乏,留守儿童第一追随者极易是他们打工的父母,对于成才标准、渠道就会出现模糊认识。大学生的出现,将励志具象化,将成才现实化,将方法手段个性化,使留守儿童在真实活动中寻求到榜样,感受到榜样的力量。当然,如果大学生能够长期连续地和留守儿童结对,除假期也能保持远程互动,效果可能更好。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工作是促发全社会重视留守儿童的必要手段。一代代大学生群体都是社会的高知识人群、精英阶层,很多人会在不同领域处于组织者领导者位置。这一群体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重视,很可能就会转化为社会、政府的认识和重视,这一群体的力量很可能就会转化成社会的力量、政府的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生连续、深入地开展“关注留守儿童”实践活动,事实上同时满足了大学生、留守儿童、社会、政府等多重需要。